



当代西方 社会学理论

杨善华 主编

高 等 教 育 社 会 学 教 材

北京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二十一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资助项目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

杨善华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杨善华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
ISBN 7-301-03992-1

I. 当… II. 杨… III. 社会学-西方国家 IV.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35923号

书 名: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

著作责任者: 杨善华

责任编辑: 刘金海

标准书号: ISBN 7-301-03992-1/C·0156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cbs.htm>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45 发行部 62752040 编辑室 62752027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印 刷 者: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毫米×1168毫米 32开本 13.875印张 347千字

1999年4月第一版 2001年5月第二次印刷

定 价: 18.00元

序

自 1979 年社会学在中国恢复以来，中国的新老社会学者就一直在为发展中国的社会学而努力。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应该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对象，这样才能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真正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因此，对理论研究应该给予高度重视。而加强对国外社会学理论，尤其是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了解西方社会学理论自 50 年代以来的发展，尤其是 80 年代发展的新动向和趋势，对于我们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对于提高我们社会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对于加强和国际社会学界的对话，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自建系以来一直重视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的研究。经过多年努力，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一支小有规模的理论教学和科研的队伍，尤其是成长起一批中青年教师，担负了理论教学与研究的相当繁重的任务，并且也已经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原国家教委现教育部高教司以及北京大学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社会学系有志于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师生根据自己的专长分工合作，撰写了这本《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向学界介绍了在帕森斯之后尤其是 80 年代以来新崛起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流派和代表人物，展示了自己研究这些流派和人物的成果，推动了

对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走向深入。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师生在写作这本书时，既考虑了它的研究特色，也考虑了它作为教学用书的特点。或者可以这样说，《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首先是作为大学社会学系或社会学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及硕士研究生的教学用书(教材及教学参考书)推出的，因此在撰写时他们认真考虑了读者的需要。就内容的新、深、广而言，这本书为我国高等学校社会学系或社会学专业理论的教学和教材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

我国当前的社会变迁对社会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更为重大的任务。我衷心希望，北大社会学系的师生能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为繁荣中国的社会学作出自己新的贡献。

雷浩琼

1998年9月

前 言

杨善华

1994年，我们在《中国大陆社会学重建以来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述评》一文（见《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作者杨善华、李猛）中指出：应对“帕森斯以后的英美和欧陆的理论流派进行较为系统的介绍”，并且“有系统地评介一批经典性著作，尤其是韦伯、齐美尔、帕森斯、舒茨、吉登斯、布迪厄、福柯、卢曼、埃利亚斯等人的著作”。经过近四年的筹划和实际工作，我们终于完成了这本《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可以说，这反映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师生这几年来在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方面所达到的水平和所做的努力^[1]。

一般认为，社会学是从一种不同于哲学和其他各门社会科学的视角，即从人的活动、互动与人类群体生活及其秩序（结构）的关系上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的。社会学理论则是对此的概括和解释，是由表征社会现象的概念、范畴和描述现象之间关系的命题所组成的社会学知识体系^[2]。由于人们的互动或者社会结构都既与人的目的、愿望、动机、价值、情绪等主观因素发生关系，同时也与客观环境、物质条件、文化、规范、制度密不可分，因此，如果在此意义上说社会学理论是综合性的，那么这同时也意味着社会学知识体系要以其他各门社会科学和社会哲学为前提。至于社会理论，吉登斯曾经说过：“我们并不把社会理论视为任何一门学科的专有领地，因为关于社会生活和人类行动之文化产物的

问题是跨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3]因为社会学理论的综合性质，它在社会理论中无疑居于核心地位。

由以上对社会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解释出发，作为对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介绍，本书在理论上因而也就有较大的涵盖面。总的说来，本书的特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它基本上都是作者在研读大量原著的基础上，通过对帕森斯以后，尤其是 80 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理论潮流的探索和思考，提炼出西方新一代社会学理论大家理论中的精华，加上自己的分析和评述，形成介绍和研究相结合的专论。书中选择的个别理论大家（如埃利亚斯和舒茨），虽然其形成和提出自己理论的时间距现在较远，但他们的理论获得广泛的承认，并产生巨大的影响，却是 70、80 年代以来的事。

2.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些理论大家的思想，本书中的多数章节都安排专节介绍其思想的渊源。这使读者在阅读本书的同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后起的理论家与社会学理论的前辈大师之间的关系。按苏国勋先生在《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社会哲学》的“导论”中，从哲学和认识论的高度对社会理论所作的分类，各种社会理论可按其对社会是否可以化约这一问题所作的回答，分为社会实在论（即所谓宏观社会学——一种从整体上综合考察和研究社会的观点），社会唯名论（即“把关注点集中在人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行动基础的相互作用的形式上”的微观社会学的各个流派），以及介于这种社会整体论和社会原子论之间的被称为“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观点（它的温和形式可以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为代表）。根据这样的分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后来这些理论大家的理论取向及其思想的来龙去脉。当然，任何一种分类都只是一种大致的尺度，并不能囊括一种内涵丰富的理论的所有特征。其实，自 80 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学理论就出现了一种综合的趋势，如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就试图去克

服整体论和个体论、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二元对立。这是我们在阅读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时必须注意的。

3. 正是鉴于上述想法，我们在介绍这些大家的思想时，觉得应在切题的前提下，尽量做到全面和详尽，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切题”首先是切社会学的“题”。本书中介绍的理论大家，有不少人如哈贝马斯、吉登斯、福柯、舒茨等，作为别的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已经被介绍过，甚至业已被多次介绍。因此，本书对他们的介绍和读解，主要是突出了他们理论中所包含的社会学的内容和特色，并在此前提下尽量做到全面，读者在阅读时不难发现这一点。对于以往介绍文字和译文中的错疏或欠妥之处，我们也对照原文尽量做了修订。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意见，我们同时尽可能全面地提供了参考阅读的文献，供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了解。

4. 西方的社会学理论是植根于西方国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之中的。创立这些理论的社会学家都在自己本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下生活，他们的理论离不开这块土壤，也不能不受其制约。因此，当这些后起的社会学理论大家在开始创造新思想的时候，也是在这样的制约之下，决定自己在理论工作方面应选择的目标的。相信本书对这些理论大家生平和所居处时代的介绍会有助于读者了解这一点，也会就此帮助读者加深对其理论的理解和评判。

5. 在写作之前，我们亦认真讨论了本书应有的风格。从作为社会学专业的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硕士研究生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的角度出发，我们尽量做到对理论的介绍和读解的明晰与条理性，以便于读者理解。但是，从作为一本学术性很强的专著这一角度出发，我们更致力于内容的深度与广度，更致力于提供自己研读得到的新见解。我们希望它能反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师生在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这样的想法也反映在本书

的编排体例中，读者可以发现这方面的特色。

作为这样一种探索和尝试，本书的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提出宝贵的批评和建议，以便今后进一步修改和补充。

本书的撰写分工如目录。每位作者对自己所撰写的部分自负文责。作为主编，我只是组织和协调了整个撰写工作，审读了全部文稿并做了文字上的校订。

本书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走完从写作到出版的全过程，应该说是与原国家教委（现教育部）高教司文科处、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及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原国家教委高教司将其列入“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体系改革”的项目，给予重点扶持；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也为此立了项；北京大学出版社将此列入1998年的出版计划，保证了该书按期出版。在此谨向他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 释

〔1〕本书的《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这一章特邀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阮新邦教授和尹德成先生撰写。

〔2〕参见《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十卷〈社会哲学〉》，苏国勋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4—5页。

〔3〕同上书，第3—4页。

目 录

序	雷洁琼(1)
前 言	杨善华(3)
第一章 舒茨和他的现象学社会学	李 猛(1)
第一节 舒茨的学术生涯与思想渊源	(1)
第二节 社会世界的意义构造	(9)
第三节 生活世界的结构	(16)
第四节 舒茨的影响和评价	(30)
第二章 常人方法学	李 猛(45)
第一节 常人方法学的理论渊源和流派	(45)
第二节 常人方法学论社会秩序问题	(52)
第三节 常人方法学与传统社会学: 批判与方法论	(63)
第四节 谈话分析	(68)
第五节 常人方法学的工作研究	(76)
第六节 常人方法学的影响与评价	(80)
第三章 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	林 彬(95)
第一节 理性行动理论的背景	(95)
第二节 理性行动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框架	(102)
第三节 法人行动与现代社会结构	(113)
第四节 理性行动理论的影响及评价	(121)
第四章 新功能主义社会学理论	谢立中(133)

第一节	学术背景、主要代表人物及基本思路	(133)
第二节	新功能主义与社会学方法论	(138)
第三节	新功能主义与社会行动理论	(142)
第四节	新功能主义与社会结构理论	(146)
第五节	新功能主义与社会过程理论	(150)
第六节	新功能主义与社会变迁理论	(157)
第七节	简要评论:新功能主义的成就与局限	(161)
第五章	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	
阮新邦 尹德成	(169)
第一节	语言本质与沟通理性	(170)
第二节	西方理性化发展的悖论	(175)
第三节	“生活世界”、“系统”与理性化过程	(182)
第四节	“生活世界”殖民化	(190)
第五节	事实与规范之间: 建立一个法律与民主的商谈理论	(195)
第六章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与现代性分析	
李 康	(210)
第一节	吉登斯的生平与学术历程	(210)
第二节	吉登斯思想的基本态度	(215)
第三节	结构化理论基本原则的展开	(222)
第四节	吉登斯的现代性分析	(237)
第五节	吉登斯思想的对象与源泉	(246)
第七章	布迪厄	李 猛(257)
第一节	布迪厄的学术生涯与思想渊源	(257)
第二节	关系论的思维方式与反思社会学	(265)
第三节	实践理论	(275)
第四节	语言与符号暴力	(286)
第五节	对布迪厄理论的评价及其理论的影响	(298)

第八章 埃利亚斯	李 康 (313)
第一节 动荡年代的坚定一生	(313)
第二节 文明化的过程	(319)
第三节 过程性视角的发展	(333)
第四节 投入与超脱:知识的社会生成	(341)
第五节 整体过程观照下的人类发展	(348)
第六节 “过程”社会学——原则与影响	(353)
第九章 福 柯	李 猛 (367)
第一节 福柯的生平与思想渊源	(368)
第二节 真理的体制:话语的考古学	(378)
第三节 监狱与性:权力的谱系学	(387)
第四节 自我、权力与知识:批判与反抗	(402)
第五节 福柯的影响与评价	(411)

第一章

舒茨和他的现象学社会学

李 猛

第一节 舒茨的学术生涯与思想渊源

一、生平简介^[1]

1899年4月13日，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ütz）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他是一个遗腹子，继父在银行担任高级职员，性格文静，对他影响不大。他的母亲则精力充沛、意志坚强，对舒茨关怀备至，对他的一生影响颇大。

1917年，舒茨以最优异的成绩从文科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作为奥匈帝国军人，在意大利前线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10月，正当他回家度假期间，奥匈帝国由于军事失利而迅速解体，不久一战结束。尽管舒茨对投身学术很感兴趣，但由于进入学术界需要相当长的学习准备时间，而这可能是他的家庭在经济上难以负担的，所以他听从讲求实用的母亲的建议，于该年底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作为退伍兵，舒茨得以参加一种速成的大学课程，仅用两年半的时间就读完了通常需要四年完成的大学课程。毕业后不久，舒茨就和他家族中的许多人一样，进入银行业，成为一名高级职员。直至他去世前三年，舒茨的职业身份一直是一位银行家。

舒茨传记的作者瓦格纳认为，正是因为这种现实生活对他的压力，促使舒茨深入地思考产生这种压力的社会秩序。从大学毕业

开始,舒茨就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从事社会学和哲学的研究。从此开始了他的所谓“双重生活”(“double life”或“split existence”)。

舒茨对社会学的研究一开始就和去世不久的德国社会学大师韦伯的思想发生了关联。1918年秋,韦伯本人曾在维也纳大学开办过社会学讲座,他的思想深度和人格魅力给许多听课的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舒茨当时尚未入学,没有机会亲聆受教,但他的许多同学听过韦伯的讲课,向他介绍了韦伯的思想。舒茨开始从事业余的社会学研究后,着手收集韦伯的作品,并进行广泛的阅读。他对韦伯去世不久出版的《经济与社会》(1922年)的第一章尤感兴趣。作为一个批判性的读者,舒茨发现韦伯的解释社会学在基本概念方面存在许多模糊之处,遂立志要为韦伯的解释社会学寻找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他经过反复探索,发现胡塞尔的现象学是最适合的工具。他利用现象学以及柏格森的哲学,深入思考了作为解释社会学基础的社会行动的意义问题,撰写了《社会世界的意义构造》一书(在舒茨去世后,此书译成英文,改名为《社会世界的现象学》)。1932年,这本书在一位日本朋友的资助下,得以出版。在今天看来,这本书和同一时期出版的帕森斯、埃利亚斯、法国的社会学研究会和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早期学者的著作一起,构成了今日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2]。

这本书的出版尽管在社会学界影响并不太大,但在哲学界和经济学界却产生了一定的反响。胡塞尔对此书大加推崇,舒茨也得以接受胡塞尔的邀请,前往弗莱堡参加了由胡塞尔的追随者和助手组成的讨论小组的一些活动。在交往过程中,胡塞尔对舒茨十分欣赏,希望他能成为自己的助手。但出于个人原因,舒茨没有接受这一邀请。

还没有等舒茨的著作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二战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1938年,正当舒茨在巴黎处理银行业务期间,德国吞并了奥地利。作为一个犹太人,舒茨将全家接到了法国,从此开始了

许多中欧知识分子都经历过的流亡生活。但舒茨一家只在法国呆了一年多，德国进行战争的步伐以及他供职的银行集团的商业决策，就促使舒茨再次举家迁移。1939年，舒茨一家前往美国纽约，从此在新大陆度过了他的余生。

舒茨到了美国后，在思想和生活上都较快地适应了那里的环境。他并没有像其他许多流亡思想家那样深受文化震撼之苦。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商务生涯使他更容易接触到美国的主流社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并没有固守自己的欧洲思想传统，而是和美国本土的思潮和观念展开了创造性的对话。舒茨广泛阅读了美国的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著作，对实用主义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并利用这些新的思想资源，进一步摆脱了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唯我论和超验主体哲学的色彩，从分析社会世界的现象学逐渐迈向一种现象学社会学。

舒茨到了美国以后，再次以一个“业余者”的身份慢慢进入了学术圈中。首先，舒茨成为北美现象学运动的一位关键人物，协助法伯（Marvin Farber）创建了国际现象学协会，并曾一度参加协会刊物《哲学和现象学研究》的编辑工作，并在上面发表了自己许多重要的社会学文章。

此外，在1943年，舒茨被聘请担任了纽约社会研究新学校的客座教授，每学期要为这所学校的研究生院开设一门讨论课（1949年后，增加为两门）。他在校中开设了许多重要课程，探讨了社会行动理论、韦伯的社会学思想、知识社会学、日常生活的情境社会学和语言社会学等重要议题。他的许多重要思想都是首先在这些课程中形成，然后再发展成文的。1956年9月，舒茨终于辞去了他在银行里担任的职务，就任该校的全职教授。但他的职业学者生涯并没有持续多久，由于长期高负荷的紧张工作，舒茨的身体早已疲惫不堪，主持社会研究新学校社会学系的工作又进一步增加了他的压力，不久他就病倒了。1959年5月20日，舒茨在

纽约病逝。

二、思想渊源

作为一位兴趣广博但却力求明晰的学者，舒茨的思想深受奥地利经济学派、韦伯的解释社会学、胡塞尔的现象学和美国实用主义等研究传统的影响^[3]。

(1) 奥地利经济学派

在舒茨的大学学习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几位老师中就包括当时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核心人物：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舒茨大学毕业后开始进行业余学术研究时，参加了一个由米塞斯主持的讨论小组，并经常受到米塞斯的亲自指导，这对他的学术发展影响很大。舒茨在这个小组中还做过几次讲演，其中有一篇被保留了下来，这篇手稿中对舍勒著作的讨论，已经展现了舒茨未来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即探索知识与行动之间的关联^[4]。而舒茨的《社会世界的意义构造》一书发表后，首先对这本书产生兴趣的也正是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这本书中提出的观点有助于理解经济学的一些基础问题。哈耶克还特别邀请舒茨为自己编辑的《经济学家》杂志撰稿。不过，在舒茨移居美国后，他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思想联系就日益模糊了。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主观价值理论和先验范畴论，都对舒茨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奥地利学派主张从主观价值的角度来理解边际效用乃至所有类型的人的行动，批评实证主义“曲解了人类的基本经验”，构成了“对人类历史的彻底误解”，用这些适用于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原则来分析人的行动，“毫无意义”^[5]。这些思想都和韦伯的解释社会学有许多相近的地方，是舒茨最初理解韦伯社会学思想的桥梁之一。

但是，从许多方面来看，奥地利经济学派和对韦伯思想产生很大影响的德国历史主义经济学派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奥地利经

济学派的典型做法是强调各种独特的历史事件本身具有人的行动特征，因此可以利用分析人的行动的理念类型 (ideal type) 来把握历史事件的意义。这样的做法初看上去与韦伯差别不大，但关键在于韦伯认为这种理念类型本身是有历史性的，而奥地利经济学派则强调它们作为先验范畴的一面。韦伯的做法是从历史出发，借助理念类型的工具来探索历史个别 (historical individuals) 的特殊性和社会行动者赋予事件的独特意义；而奥地利学派则是从先验范畴出发，逐渐剥离历史事件中的特殊性，分析其中体现的“不易变动的每个人的行为范畴”^[6]。简言之，韦伯为了保护历史的具体性和特殊性而宁愿牺牲理念类型的“纯洁”，而奥地利经济学派则为了捍卫先验范畴的形式性而清洗掉历史的“杂质”。在这方面，舒茨则更多地接受了奥地利经济学的观点，反对极端的历史主义做法，认为始终存在先于历史范畴的非时间范畴，而我们正是借助这些“类型” (type) 才能理解历史^[7]。这样，在韦伯著作中占中心地位的比较历史分析和对各种不同的历史社会中意义取向差异的强调，到了舒茨的解释社会学那里，就骤然转变为对普遍性的“类型”的分析。在舒茨对韦伯思想这种“去历史化” (dehistoricization) 的“操作”中，奥地利经济学派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8]。

(2) 韦伯的解释社会学

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发轫于对韦伯的批判性发展。终其一生，韦伯的解释社会学学说都是舒茨社会学思考的出发点。我们甚至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于舒茨来说，社会学就意味着韦伯。但是，舒茨和韦伯的思想风格存在根本上的差异^[9]，他几乎是沿着韦伯根本想象不到的方向发展了后者的观点。因此我们不能将舒茨的学说简单地看作是韦伯思想的“完善”^[10]或者“彻底化” (radicalization, 瓦格纳语)。韦伯的社会学著述充满了各种矛盾和冲突，而韦伯在发展自己学说时，也正是借助着这些思想上的